

元 亨 文 存

呼唤史识

当代长篇创作的史观研究

◎ 谭元亨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元亨文存 ·

呼唤史识

——当代长篇创作的史观研究

谭元亨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出版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唤史识：当代长篇创作的史观研究/谭元亨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7

ISBN 7-5361-2865-7

I. 呼… II. 谭… III. 短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3645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076 电话：(020) 87554153

印 刷

江门市蓬江中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序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推出几本谭元亨的学术专著，自然是各方面的合力促成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是兴奋。一是当今南国的中青年学者，能出系列学术专集的，实属罕见，可喜可贺。二是这几本书，恰好涵盖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中国文化史观》是一部颇有分量的哲学专著，八年前初版时已有定论；《广府寻根》，恐怕是研究广府文化与历史的发轫之作，谭元亨以研究客家文化著称，如今又拓开一条新路，不容易；第三部，便是《呼唤史识》，这是一部文学批评之作，无论是申报项目，以及支持出版，我都参与了，自然是力荐者。这三部专著，可以说代表了谭元亨学术研究的最新也是最高水平，如果加上他的客家研究的话。至于他的客家研究专著，当有另一个系列来收入，因为那数量大得多了。三则，谭元亨本是以文学创作蜚声文坛的，一部当代文学史中，少不了要提到他这部或那部作品，我案头上就有他洋洋 150 万字的《客家魂》三部曲，而现在，他却又以学术上的锐意进取令人感佩，其学术上的成果，亦不亚于他的文学创作。北京一位著名理论家曾称他“大双栖”（教学与研究）、“小双栖”（理论与创作）均游刃有余，亦非虚言。前段，报纸上反复讨论作家能否带研究生时，谭元亨却早已带上了研究生，只是他不愿出这个风头，拒绝出来“作证”罢了。

我与谭元亨相识，也已有十年了。也许是历史的创伤，他较沉默寡言，为人处事，相当地低调，只是书一本一本地产出，论文一篇一篇地发，令人惊奇。直到成立珠江文化研究会，我们相处

的时间多了，才觉得他的刻苦、他的扎实、他的严谨，似乎更多一些学者的本色，而少一些作家的罗曼蒂克或张扬。当然，先以作家成名，而以学者身份出现，难免有人对其学术上的成就将信将疑。而这几本学术专著，当为这些人释疑。

三本书，虽说可粗分为三个学科，但也是相互贯通，相互辉映的。如果说，《中国文化史观》是总纲的话，那么，《广府寻根》正是以其文化史观来审视一个南方的民系，成为其一个“个案”，也同样是一个延伸。而《呼唤史识》就更是一脉相承了，只是用其文化史观，在审视南方的若干重要的文学现象及文学作品，既是“个案”，也一样是延伸。三部的勾连，也可以看出作者做学问的严谨态度。

《呼唤史识》中提出审美的“卓然之则”，是谭元亨在研究上的一个新的建树。

过去“文以载道”的批评，则是源于传统的“应然之则”的，这虽说是上千年定位不移的伦理准则，可至今在文学批评上仍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它，为狭隘的伦理中心主义张目，前段那么多的帝王将相，在文坛、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正是这种伦理史观在起作用。

而历史实用主义的批评，也就是所谓的“实然之则”，如今也充斥了整个文坛，所谓“资本时代的爱情”，大款大腕与美女的童话，钱可通神的万能传奇，迷倒了不少追星族。殊不知，即便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论是莎士比亚，抑或雨果、巴尔扎克，都对金钱神话予以猛烈且深刻的批判。而今，几个世纪都过去了，我们的文人却浑身的铜臭味，实在恶心。

在“应然之则”与“实然之则”风行文坛之际，谭元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卓然之则”以抗衡，不仅体现了理论的勇气，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记得他的这个提法，出于90年代初，已见诸于报端。1995年，他的文学批评专著《土地和农民的史

诗》，便已整章的篇幅论证“卓然之则”了，而后，在他若干论文与论著中，也进一步加以阐释。今天，可以这么说，他是以整整一部专著，对“卓然之则”加以详尽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以及具体到一部部作品。

谭元亨的“快手”是出了名的，那是写小说。搞理论，他也思路敏捷，很少条条框框，一个观点拿出来，总教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我觉得，这与他涉猎广博，厚积而薄发是分不开的。悟性，总是与经验分不开的，他不仅文史哲贯通，数理也同样下功夫，据我所知，他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学建筑，不仅微积分等高等数学，连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都学完了，近年他出的诸如《南方城市美学意象》，同样显示出他多学科的深厚基础。其实，专才与通才，本就不应是一个对立的观念。不通想专，不一定做得到，光通不专，意义又何在？点与面，二者应该是相得益彰的。

在这部专著中，谭元亨还有不少新颖的见解，这就不一一点出了，“卓然之则”是一个纲，抓住这一条就够了。

无论是人生阅历，饱受磨难，还是文史兼通，屡有建树。最后送给他一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联，以作共勉：

能受天磨真铁汉

不遭人嫉是庸才

谭元亨见之，必定会心一笑。

如此，足矣！

黄伟宗

2002年11月19日

作者是中山大学教授 广东省政府参事

自序

在未到高校工作之前，我的理论作品都带有一种随意性，并不曾刻意地去追求什么，甚至不准备自圆其说。包括洋洋洒洒30万字的《中国文化史观》，都是一种冲动的产物，更不说那几千字、万把字写毕而掷的论文了。

作为这本文学论著中的若干章节，便是80年代中期这样的随意之作，我当时都不曾想到，几乎20年后，我会把它们重新拎起来，作为一部相对完整的文学批评专著中的有机的一部分，虽不能说形成一个什么系统，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区别于流行的林林总总的所谓“理论体系”。

如果说，《中国文化史观》是个总纲的话，那么，这次同时出版的《广府寻根》，当是以文化史观观照下，对中国一个最大移民族群作的全新的审视与阐释，不拘陈言，敢于立说；而这部《呼唤史识》，也同样是以文化史观观照下，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南方的文学作全新的审视与阐释，不敢说惊世骇俗，但当是一声棒喝！

这里，我尤为强调的是南方的文学。

一直以来，有人总是认为，南方有超前的经济实践，却每每是滞后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广东，无论创作手法，还是文化意识上，都是相当地传统的。什么“后现代”呀，什么“魔幻”呀，“结构主义”呀，种种，在广东都找不出来，一味是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写人物，仍在讲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类“过时的”理念，加上这里历来是“文化沙漠”，这里的文学作品也就不大为人所关注了。有人甚至认为，连我这位当年全国赫

赫有名的“湘军”中的一员，到了广东，似乎也一般“等而下之”了。

果实是如此么？

一转眼，我重返广东又10多年了。

广东火热的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出现过内地周期性的间歇，尤其是作为我的故乡顺德，更是走在各项改革的前面，虽然也免不了惹来种种非议并为此蒙受打击及损失，可仍一往无前。很难设想，一个面积仅800平方公里的小县，何以会创出众多的经济奇迹？！而这些，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这里一样有丰厚的文化，只是异于正统的另一种文化，所以才不被认同，所以才被斥之为“文化沙漠”——关于这一点，我已在《广府寻根》中作了较雄辩的证明，这里就不多说了，只要去想想2000多年海上丝绸之路是在这里始发的，几十个世纪的海洋文明又怎样在这里延续，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又怎样一下子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底气就行了。

文学呢？文学也当一样。正因为经济改革走在了前面，对人们的历史观念不可能不产生重大的冲击。换句话说，今天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们，已经没了过去的宿命观、依附心理，他们敢于拼搏、敢于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来，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历史观，也自然比传统的要先进得多，甚至超前得多。而这一切，则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上来。

重要的不在于形式上怎样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内容本身怎样。而内容本身，又是以怎样的历史观为指导，或者体现出怎样的历史观，这才是最重要的。历史观，便是作品之魂。而南方的文学作品，恰巧正是在历史观方面高扬起这样一个进取的、亢奋的灵魂。

为此，我的这本小书，便主要是、甚至说，全部是，注目于南方，尤其是广东的文学，因为它代表的，正是历史前进的方

向，正是未来！无论人们怎么贬抑它，或者无视它，我都要为它张扬，为它鸣不平。在都市文学上、在区域文学上，以及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超前性。

而在历史观上，更是这样，循环史观、气数史观等中国古代陈腐观念，在南方已不再有市场；那种仕族知识分子的糜烂、顾影自怜、无病呻吟，乃至自虐自戕也同样难以找到，而自命的救世主的空谈，这里更没有听众——这，同样也就决定了这里的文学作品会是怎样的！

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

感谢广州市社科联，在理论书籍出版困难的今天，不仅支持了我这个项目的立项，且最终支持了这本书的出版，凭此，也可以看出南方究竟是否属于“文化沙漠”。

当然，也感谢书中所涉及的众多作家，没有他们奉献的一部部力作，我又怎能做出新的立论呢？

永远的阳光明媚，当是南国最大的特色，愿我们的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永远沐浴这样的阳光。

目 录

绪论 从大洪水与巴比塔说起	(1)
一、缘起：历史意识与思维方式	(1)
二、跟进：当代文学作品之魂——史观	(9)
三、观照：历史与文学批评的广角镜	(21)
第一章 回归文学的历史俯瞰	(30)
一、唯心史观与机械唯物论的双重陷阱	(30)
二、横向的剖析与纵向的切入	(43)
三、现实的敏锐与历史的执着	(49)
第二章 都市文学的现代阐释	(60)
一、商品意识与道德代价	(60)
二、都市演进的不同时态	(69)
三、底层：喧嚣中的“下只角”	(81)
第三章 纪传文学的宏观视野	(88)
一、参与感与历史感	(88)
二、“残树”的文化之根	(99)
三、东西方的两个圆梦	(112)
第四章 乡土文学的民族化与当代性	(124)
一、“现实主义的胜利”	(124)
二、来自历史深处的双重清醒	(133)
三、切中“普遍的异化”的要穴	(145)
第五章 珠江文化与区域文学	(153)
一、理论的实践品格与可操作性	(153)
二、方言与思维方式、文化心理	(167)

三、精神史的开拓与追溯	(179)
第六章 儿童文学的背离与回归	(188)
一、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蓦然回首”	(188)
二、非虚构：还给儿童一个真实世界	(201)
三、校园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225)
第七章 知青小说、打工文学及其他	(238)
一、知青小说的焦距及价值取向	(238)
二、打工文学：前卫与滞后	(248)
三、诗歌大国的悲哀与呼号	(258)
第八章 东方神秘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及其他	(265)
一、直觉、经验与审美心理	(265)
二、明星、移民与文化误区	(270)
三、困兽犹斗的人道主义	(278)
综论 包容与超越	(291)
一、无意义、悖论及后现代	(291)
二、“自己的”与“世界的”	(300)
三、应然之则、实然之则与卓然之则	(309)
后记	(322)

绪论 从大洪水与巴比塔说起

一、缘起：历史意识与思维方式

陈旧的“循环史观”、“气数史观”，竟在文学中打上“新潮理论”的幌子又卷土重来，这不仅是史识上严重的滞后，而且有可能在思维方式上，颠覆我们业已取得的进步，重新回到“左”的僵化模式上。本来，“左”就是与封建意识一脉相承的……

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同步的么？

也许曾有过这样的时刻。

在东西方不同的历史记载中，都有过人类幼年时代大洪水的故事，如《创世纪》第七章第20节所说，洪水铺天盖地，大雨不停地下了40昼夜；而中国的《尚书》中则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尔后，科学本身则做出了证明，洪水之说不是虚构的神话，而是确有其事。

人类，就是在这样的浩劫下硕果仅存的智慧动物。

但并没多久，人类历史的同步便被打破。我们不难看到，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相继沦亡与毁灭，如今，只剩下惟一的古老的中国文明，但这一文明，却在近几个世纪里，被其他新兴的文明

所赶上，如不更新，则是必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以拥有未泯灭的古代文明而骄傲过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挑战比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峻。古巴比伦湮没的历史教训今日似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顶……这样的挑战以及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参差不齐，也许更具有启迪性。同步永远是短暂的，不同步却是永远的。一度沉寂、野蛮与落后的民族，以其虎虎生气，兀地往前冲刺而遥遥领先；一度喧嚣的、文明与进步的民族，却暮气沉沉乃至腐朽败落，沉滞不前，有的甚至在历史中消失。后起者征服了先行者，先前的野蛮者打败了稍后的文明人，这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了。

于是，《圣经》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故事：洪水劫后，人类决定修一座通天塔，那塔节节升高，直上云霄，这下子惊动了上帝。耶和华亲临，看人类齐心协力，通天之梦指日可化作现实。于是，上帝为之恐惧了，决定变乱人类各自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从而无法通力合作。这一来，塔便修不下去了，人心也随之涣散了，各走了各的路。

这一来，这座未成的通天塔，便易名为“巴比塔”，在希伯来语中，“巴比”的意思就是“变乱”。人类的语言就此变乱，人类的历史也就此变乱，而人类不同群体的思维方式，自然也更乱了。

这当然是神话，而非大洪水的故事可经得起科学考证。

但是，人类的语言、历史及思维方式，难道就划一、归整过么？神话只是通过曲折的方式，用以隐喻某个不可置疑的客观事实或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它不需要科学考证便是众所周知与公认的共识或公理。

于是，在不同民族之间，出现语言的误区、历史的误区，以及思维的误区，则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人类迄今造不成通天塔，而只留下一座残缺的“巴

比塔”。

将来呢？

这绝不是三两句话便可以回答的问题。或许，这一本书也不一定能做出回答。我们只在努力做出尝试，如同人类自从修通天塔以来所作的无数次尝试一样——而这些尝试都只有失败的记录。当然，成功只需要一次便够了，哪怕前边曾有亿万人次对此做出过许诺与预言。

历史的不同步与思维方式的迥异，自然是密切不可分开的。那么，我们不妨先注目于历史。

前面提到了，中国的古代文明，是惟一未曾湮没的文明，而其他三大文明早已寿终正寝了。但是，中国文明也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那么幸运，好几回，都已差点到了灭绝的边缘。

最发人深思的，莫过于古罗马文明覆灭之际，中国文明亦面临同样的命运，其危险亦同样来自同一个地方——欧亚大草原。

无疑，影响历史进程的，自然因素是不可排除在外，其范围之大，时间之久，均有目共睹，如前面提到的大洪水。而政治、经济诸因素，有时也不得不退居其次。某些经济因素本身就是自然所为，只是在历史上作为显性因子罢了。至于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已。

而造成当时两大文明——古罗马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巨大威胁的，便是三四世纪间，辽阔的、丰腴的，曾养育了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的欧亚大草原，面临了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迫使在那里世代生存的骁勇善战的匈奴人，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向西，以及向南侵袭，以开拓他们生存的疆域。

于是，整个世界的社会格局，便由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在世界史上，被称之为“民族大迁徙”——不过，这仅是指西亚与欧洲的民族大迁徙，没包括中国在内。而在中国，则是“五胡乱华”以及“衣冠士族”大规模的南迁——严格地

说，这应包括在世界民族大迁徙这一重大的世界事件之中。

可惜，过去未曾有人把这发生在同一时间相差仅有几年的两处大事联系在一起研究。

北匈奴人骑着战马，越过了欧亚大草原，从中亚经里海进入了顿河，第聂伯河流域，征服了阿兰人、东哥特人，紧接着，又横扫了黑海北边的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则横渡了多瑙河，摧毁了罗马军团，末了，竟攻克了罗马古城，劫掠了三天三夜……在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古罗马文明寿终正寝，漫长、蒙昧的中世纪千年黑暗王国来临了。

与此同时，在东亚，八王之乱后，便是五胡乱华，同样是匈奴人——在这边是南匈奴人，也离开了故土，出兵攻陷洛阳，不数年，又尽取幽州、并州等州，紧接着，南取豫州，徙都邺城，控制了淮北，整个中原已落他手。而东胡族鲜卑，在匈奴衰落后，长驱直入，尽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诸州。氏羌族，则趁机占据关、陇，驱兵东进，复胜鲜卑，西取凉州，南临淮水……

那边，是北匈奴、阿兰人、哥特人……

这边，是南匈奴、鲜卑人、氏羌人……

那边，古罗马文明万劫不复。

这边，华夏文明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使用了“严峻考验”的字眼！

五胡乱华，东亚民族大迁徙，——而这次大迁徙的结局，便与欧洲古罗马文明覆灭的结局却大为迥异了。众所周知，在西方，是文明的大倒退，堕入“千年黑暗”王国的中世纪。而在东方，出现的却是盛唐文明以及作为世界科技巅峰的宋朝文明。

显然，这同南匈奴未能似西匈奴灭掉古罗马一样灭掉华夏文明相关。南迁的古汉族，在江南、在华南，仍可退守一块又一块的“飞地”。

所谓“飞地”，在这里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民族的精华部分，在巨大的战乱或灾祸面前，不至于被彻底摧毁，至少有所保存，从而在灾难以后，继续辐射出它文明的热力，使四邻受到影响，得到开化，从而又重新恢复其活力，蓬蓬勃勃地重新振兴起来。中国话说“火种”的意义可以说相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埃及作为古希腊文明的“飞地”保存有上百年，在古罗马为希腊文明完全同化后才消失，不能不承认其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南方，作为中原土族避难的“飞地”，便形成了古汉族不可摧毁的“火种”，在大难以后，又重新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与征服者的征服路线相反，开始了反征服，以软性的反征服克服了硬性的刀光剑影的征服。

于是，一部中国文明史，便出现了几乎可称得上有规律可寻的特有现象，这便是——

武力南征，文化北伐。

周商之战，暂且存而不论。南北朝对峙，连北朝也不得不认南朝为“正朝”，要掳掠南方的文人以壮其文化底气。活跃在江南乃至岭南的阴（铿）何（逊），则成了律诗的创制人，连唐代两大诗圣都称“苦学阴何颇用心”，正因为有了南朝的文化保存与发展，才有盛唐文明。至于元军南下、清兵入关，无疑是属“武力南征”之列，可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文化中心都已在南方而非秋气肃杀的北部了。至于近代，就更加明白了，文化大师、思想家，也大都出在南方。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一直到孙中山、廖仲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至于文学艺术上，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也无一不出自南方。其实，李鸿章早就在惊呼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了。

这段历史，仍让人回忆起当年东、西方文明面临的共同威胁而又具有完全迥异的命运。虽然近代史上我们面临的不是蛮族入

侵而是被人用炮火轰开国门，但华夏文明毕竟又一次通过了“死亡之门”。这均是发人深省的。

古罗马文明当年是被打得片甲不留，最终灭亡了。

历史在西方停滞了。

只余下“上帝”在思考。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当在此首先划出了个分界线。

在西方思维史中，这一区间内的思维方式自然是僵化的、线性的……

然而，在东方，华夏文明或古代中国文明非但没有寂灭，相反，经历过一段痛苦的蜕变与反思后，迅速地又走向了一个文明的峰巅：盛唐文明。众所周知，这是在中国魏晋南北朝这一最痛苦的分裂与混战之后更新了的文明，而且是吸收了外来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之际，得到了重新激活。唐代，中国的经济空前地活跃与发达，文化上更是奇峰兀起，给中国历史造就了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至于科学上，也为宋代走在全世界科学前列做了充分的准备。盛唐文化气势磅礴，气度宏阔，以至惠泽四方，称雄全球，这都是举世瞩目的不可移易的历史事实。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思维发展史，也同样是绚丽而争相斗艳的。文化上的兼容并蓄，也带来了思想界的活跃，而最突出的标志便是其思维认识方式上，打破了僵硬的、线性的概念模式，提供了生动活泼的感性启示，在老庄的直观思维基础上，经过玄学阶段，走向了悟性思维——直到今天，这种悟性思维方向为西方思维科学家所“发现”而捧为至宝，从而跨过了众多思维发展的阶段，被视为未来的或21世纪的思维方式。关于这点，后面我将有专章的阐述。

上面的历史或思想史演变的对比，给了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尤其是，曾几何时，曾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思维方式的民族，为何反而抱住了最僵化、最机械的线性思维不放，用当今西